



总主编 丁伟志 郭永才 张椿年

执行主编 刘培育 杲文川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发展历程回忆

—— 史学卷 ——

主 编 陈启能

副主编 商 传 殷玮璋

李毓芬 左玉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总 主 编 丁伟志 郭永才 张椿年

执行主编 刘培育 杲文川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发展历程回忆

—— 史学卷 ——

主 编 陈启能

副 主 编 商 传 殷玮璋

李毓芬 左玉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史学卷/陈启能主编,商传、殷玮璋、李毓芬、左玉河副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161-3264-7

I. ①中… II. ①陈…②商…③殷…④李…⑤左… III. ①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概况—中国②史学—发展—概况—中国 IV. ①C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4424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黄燕生
责任编辑 黄燕生 李 是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8
插 页 2
字 数 459千字
定 价 76.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

编委会

主 编 丁伟志 郭永才 张椿年

执行主编 刘培育 杲文川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本源	冯昭奎	左玉河	刘 红	刘国平
刘楠来	江太新	李毓芳	陈启能	陈家勤
吴家骏	沈蕴芳	杜晓山	张 森	杨匡汉
杨雅彬	林连通	周 方	周志宽	周用宜
周明俊	郎 樱	孟宪范	胡广翔	殷玮璋
郭家中	徐世澄	徐耀魁	顾俊礼	陶文钊
赵剑英	章丽君	商 传	黄燕生	崔勤之
程恩富	曾 军	温伯友	傅青元	董谊思
蔡曼华	樊建新	薛克翹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

前 言

本书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组织的回忆录式的文集，本书的宗旨是通过专家学者的回忆，记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旨在留存，为有志于梳理和研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的学者提供第一手的资料。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已走过了64个春秋。在这段极不平凡的岁月中，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创作的大批科研成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提供了扎实的理论根据，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绩辉煌。同时也不要忘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四人帮”的干扰，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今天，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处在大调整、大发展的时期，为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为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有强大的“软实力”，也就是要有强大的思想理论和文化武器，须臾离不开科学发展观。创新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件极其艰巨和复杂的伟大工程，它需要借鉴历史经验。

我国有一大批至今仍健在的，当年曾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百花园中，默默耕耘，辛勤播种的老领导、老专家、老学者。他们参与了有关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决策，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创建、研究体制的变革、干部的培养、刊物出版的筹划、重大理论问题的争论，等等。他们的亲身经历，不仅使我们看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建设的具体图景、发展轨迹，也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他们的

回忆录极具史料的价值，值得永久保存。现在这些老领导、老专家、老学者大都已进入暮年，若不把他们在哲学社会科学战线上奋斗的，又鲜为人知的故事记录下来，将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这些回忆录的价值远不止上述这些，它们还是前辈们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从回忆录中，我们看到这些前辈为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所表现出的无私无畏，披荆斩棘、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忠于人民的高尚品德，永远是我们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

本书的编辑方针是，不苛求体例的一致，不拘文章的长短，以亲身经历，再现当年事实为重，在编辑过程中，除个别文字和语句外，不随意更改文章，如遇编者看不准的地方，也一定要征求作者的意见，获得作者的同意后再作处理。

本书组稿范围限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内，由编委会每位成员分别组审，共汇集文章数百篇，约500万字，分马克思主义、文学、史学、哲学宗教学、经济学、政法社会、国际问题和综合八卷。本书自始至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局和许许多多学者的支持，并承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此深致谢意！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编委会 谨识

卷 首 语

关于编写本套丛书的意义，在“总序”里已有说明，这里无须多言。“史学卷”是集中反映历史学科学者们对本学科的发展变化、人事浮沉、学科嬗变、学术积累等等方面的回忆和反思。

需要说明的是，历史学科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基础学科，内容包罗万象，十分丰富，地域遍布全球，时间贯通古今，学科分门别类，人才层出不穷。即使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片的研究所说，也有考古所、历史所、近代史所和世界历史所，因而在一卷书里是无法全都包含进去的。本卷收集的文章有四十多篇，反映了整个历史学科的很小的一部分，只能是片断的、零星的回忆。我们希望通过这些片断多少还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中国历史学科发展的某些方面，某些成果，某些问题和某些代表性人物。

还需要说明一点的是，书中收的文章，都只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哪怕是对同一件事都可能有不同的，甚或可能有相反的看法；而且，一般来说，各人的看法都不易完整地、完全客观地反映事物全貌，这是各位读者应该注意的。因此不能走向另一极端，而完全否定任何回忆的意义。应该说，大多回忆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有它的意义的，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帮助人们了解事情的真相。这也就是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书的目的。

本卷编者

目 录

机构与学科

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	张海鹏 (3)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创建与中国世界 历史学科的发展	张椿年 (11)
中国史学会的建立	蔡美彪 (18)
由“险学”到“显学” ——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	韩信夫 (24)
考古研究所动物考古研究回顾	袁 靖 (38)
中国植物考古学的学科发展历程	赵志军 (49)
回忆中国史学理论学科和杂志的创建与发展	陈启能 (56)
我与新时期中国史学理论研究	蒋大椿 (69)
建院三十余年来历史研究所的敦煌学研究	杨宝玉 (77)
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回顾与前瞻	陶罗生 (82)
我所知道的“近代史讨论会”	刘存宽 (96)
我所经历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	张振鹞 (106)
我所经历的太平天国史研究	王庆成 (120)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二十年回顾	刘宗绪 楼均信 (126)
中国日本史学会的成立与发展	贺山文 (133)
《第5号提案》与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	张晓华 (146)
我所知道的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	周新民 (157)

我所知道的《近代史资料》编辑室与荣孟源	章伯锋 (167)
---------------------------	-----------

人物与业绩

回忆范老论学四则	蔡美彪 (183)
沈从文与古代服饰研究	赵连赏 (192)
历史学家的品格	
——忆黎澍师	陈铁健 (199)
考古所碳十四测年工作的回顾	仇士华 (214)
我一生干了一件事—— ¹⁴ C 测年	蔡莲珍 (220)
我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历程	郑振香 (236)
定陵发掘亲历记	赵 信 (254)
我是怎样走上民国史研究道路的…… 杨天石口述 罗敏、李在整理	(262)
我与 30 年来的陈独秀研究	唐宝林 (274)
秦阿房宫遗址考古记事	李毓芳 (280)
为维护考古科学的尊严	
——关于秦俑坑发掘的一段记忆	殷玮璋 (293)
我在近代史研究所 60 年的工作回忆	李 珣 (302)
回忆满城汉墓的发现与发掘	卢兆荫 (309)
近代史研究所若干往事的回顾	丁贤俊 (314)
我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的 21 年	赵云田 (324)

著述与期刊

《甲骨文合集》	
——甲骨学之丰碑	孟世凯 (333)
《中国史稿》的编撰始末	宋家钰 (350)
千秋青史情无限	
——蔡美彪先生谈十卷本《中国通史》	许殿才 (354)
我与《中国史研究》	李祖德 (364)

我主编《近代史研究》时的若干举措	曾业英 (384)
《近代史研究》初期工作回忆	曾景忠 (393)
回忆《世界历史》杂志的初创阶段	陈启能 (408)
回顾《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历程	李世愉 (422)
二十四史校点缘起存件	蔡美彪 (432)

机构与学科

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

张海鹏

胡绳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他的理论兴趣广泛，著述涉及哲学、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以及时政评论。他不仅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贡献了心力。作为学者，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他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据我所知，胡绳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关系很深，且一直十分关注近代史研究所的发展。在胡绳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在这里回忆他与近代史研究所的关系，以作为对他的怀念。其中有些是我亲身经历的，有的是听说的，可以说是亲历、亲闻、亲见。我是晚辈，对他与范文澜、刘大年，以及其他近代史所老一辈学者的关系知之不多、知之不详。这里回忆的，只是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关系的点滴而已。

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始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胡绳自己说，与范文澜初次见面是1949年，那时候他们刚进入北京。此后便来往不断。从近代史研究所印制的《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中，可以约略看出范文澜、刘大年、胡绳信件往返讨论学术问题的情形。近代史研究所是1950年5月在华北大历史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的。1953年，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它是中国共产党内讨论中国历史问题的机构，不发号施令，由陈伯达任主任。该委员会开过一次会，决定加强历史研究，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以郭沫若为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和以陈垣为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就是根据这个决定成立的。以此为序，近代史所改称第三所。刘大年 and 胡绳是这个历史研究委员会的最年轻的成员。从

1954年近代史研究所也就是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成立第一届学术委员会起,田家英、胡绳、黎澍就一直是所学术委员会的委员。胡绳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1985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才辞去了所学术委员一职。他与近代史所名誉所长、先于一年去世的刘大年关系密切,常相往来,这是众所周知的。《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收有胡绳写给刘大年的信,讨论诗韵,真情坦率,可见一斑。刘大年几次告诉我,近代史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一定要聘请几位所外的知名学者,并常举田家英和胡绳为例。

我第一次见到胡绳大约是1975年。当时传闻胡绳将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担任领导工作。有一天胡绳到学部召开座谈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说起学部的刊物《新建设》,胡绳同志便提起民国初年的《建设》杂志以及后来的《中国建设》杂志,同时对民国时期的历史娓娓道来,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979年近代史所创办了《近代史研究》杂志,杂志的创刊号发表了胡绳的《义和团的兴起和失败》,这是他即将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981年正式出版)一书中的一章,希望借刊物来征求学术界的意见。他希望近代史所学者们提出意见,还特别给丁名楠研究员写信,恳请批评。近代史所近代政治史研究室全体研究人员开了两天会,提出读后感,虽然对书中若干史实和技术性问题提出了不少意见,但对本书作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追求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深为佩服。政治史研究室主任何重仁几次告诉我,他为胡绳著作中体现出来的理论深度和高度的概括力所深深折服,反复研读,反复琢磨。据说,胡绳曾对刘大年说,自己的书不是中国近代史的正史,正史要由近代史研究所去写,所以他不用“中国近代史”一类的书名。可惜,直到今天,近代史研究所也没有编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的“正史”来。这是需要近代史所的学者们反躬自省的。

1982年,胡绳应邀率领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去美国芝加哥参加学术讨论会,在为数不多的成员中,有近代史研究所的一名中年研究人员。在芝加哥,胡绳为首的中国大陆学者与秦孝仪为首的台湾学者有过学术上的正面交锋。此行对于促进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的相互了解,对于推动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的学术交流,良有裨益。

1985年初,近代史所副研究员王来棣在《近代史研究》第1期就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发表了与胡绳商榷的文章。不久,胡绳就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来棣很紧张,有人说,“得罪权威,早晚要倒霉”,好像发

表了与胡绳不同意见的文章，就是捅了马蜂窝。王来棣赶忙写信给胡绳坦承这种担心。胡绳在1985年5月10日复信给王来棣，说明她的“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并且心平气和地就王来棣提出的问题进行学术讨论。胡绳在信的末尾说：“我作为您所评论的书的作者，虽不尽同意您提出的基本论点，但是还是认为您的文章发表是很好的事。您的文章不但能引起读者思索有关的问题，而且对于书的作者也是有益的，这将促使作者进一步考虑您所提出的问题。”这封信，经胡绳和王来棣同意，发表在同年的《近代史研究》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他领导下的一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就学术问题进行完全平等的讨论，这对于促进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和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后，胡绳对近代史所王庆成研究员有关洪秀全早期思想的研究文章，对余绳武研究员有关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文章，都有过明确的赞扬意见。

1986年，北方某学术刊物发表了一篇贬低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抗英作用的文章。胡绳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曾指示近代史所要有作为。近代史所所长余绳武在所内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对这篇文章提出了批评。会后，我结合这次会议的讨论，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在当时的《红旗》杂志发表。这篇文章采用说理的办法，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依据鸦片战争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反驳，后来为多种书刊选用。

1987年，近代史所研究员陈铁健在《历史研究》杂志发表了一篇讨论红军西路军的论文，引起了中共高层的反应，刊物和作者本人都感到紧张。当时的所长余绳武后来告诉我，胡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一个小型讨论会，参加人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史学工作的副院长和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外，还有作者、《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主编、刊物的责任编辑等。胡绳宣读了中央领导人杨尚昆、李先念和邓小平等此前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批示，然后说，“研究无禁区”。作者在研究中没有犯什么错误，但是已经有了发表中共党史研究文章的刊物《中共党史研究》，《历史研究》以后就别再发表有关党史文章了。胡绳作为院长并没有对作者提出批评，还说，这类问题中央已经有了意见，我没有向你们传达，责任不在你们。对学者采取了保护的态度。

1990年，是近代史所建所40周年，所里决定以学术活动的方式纪念节日。我们办了两件事，一是铸了一个范文澜铜像，以示景仰与怀念；二

是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扩大近代史所的影响。范文澜铜像揭幕仪式,胡绳出席,并在仪式上发表了即席演讲,高度赞扬了范文澜用马克思主义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功绩,对范文澜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批前辈学者表示了深深的怀念(演讲后来收在《胡绳全书》第3卷)。那年9月举行“近代世界与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胡绳应邀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的演讲。演讲后,胡绳稍做了一点修改,嘱我送《人民日报》发表,后来也收在《胡绳全书》第3卷。2000年5月,是近代史所建所50周年,召开了一个庆祝会。这时候,因胡绳身体不好,我们不敢、也不忍心再邀请他亲临指导了。

胡绳对近代史所的工作非常支持,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近代史所从他那里得到的支持是最多的。每次研究所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只要接到邀请,他都积极参加,并且发表演讲,而拟稿从不需要别人代劳。近代史所成立4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如此,1991年9月在沈阳召开“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也是如此,1993年1月在北京召开“近百年中日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还是如此。他说过,如果你们开国际讨论会,我去替你们接待外宾。所以,那几年近代史所主办召开的国际讨论会,都要单独宴请海外学者,东道主都是胡绳或刘大年。这样做扩大了近代史所在国外的影响。1996年年中,因近代史所在香港史的研究中有一定成绩,欲借香港回归前后的时机,在香港召开一次有关香港历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需要筹集资金。我给胡绳写信,汇报这一想法,并希望借重他的名望在香港找到资助。胡绳极为痛快,允诺替我们设法。于是我给他写封信,正式提出这一要求,并且建议直接向一位来自香港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的香港人士提出。对我这封信的写法,他几次亲笔修改,然后退给我重新打印。胡绳在我这封信上写上批语,希望这位副主席有所措手。大约在这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胡绳亲手把这封信交给了这位副主席。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这件事未果,但有关香港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仍于1997年12月在香港大学召开,虽然如此,胡绳对这次会议的关注和热情,令我们十分感动。

胡绳对近代史所的学科结构、人才状况十分了解。1991年年中,他曾到近代史所发表演讲,谈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些想法。在谈到近代史所的工作时,对近代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很是称赞。十年来,由于各种原因,新的研究人才接续不上,虽然我们力求吸引新的人才,中外关系史研

究仍然没有恢复到兴旺的时期。我作为所长，深感愧疚！

大约1990—1991年间，胡绳提出在近代史所组建当代中国史研究机构。此时近代史所所长是王庆成研究员。王庆成与我商量后，我们起草了报告，论证了开展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建议先在近代史所组建当代中国史研究室，然后扩大发展成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心、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国史馆。这个报告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后，便没有下文。我没有就此事再问过胡绳。我后来想，也许是已经组建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已经有了眉目，再在近代史所建立相似机构的设想就不便再提起了吧。

1996年初，我曾随金冲及和广东社科院院长张磊一起到胡绳家，商量以孙中山研究会名义，借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的机会，在广东翠亨村召开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时候，胡绳身体很好，头脑清楚，对讨论会召开的主旨指示得很清楚。待到会议举行的这年11月中，胡绳出席了大会。我感到他步履缓慢，身体大不如前了。后来听说，半个月后他住进医院做肺癌切除手术。

1997年，我曾三次给胡绳写信。一次是4月，因为近代史所的所刊《近代史研究》将在8月出满100期，考虑到创刊号及以后都曾发表过胡绳的文章，我和编辑部期望胡绳能在100期上发表文章或者题词。这将对刊物和读者很大的鼓励。信中提到希望在6月15日以前收到，以便赶上制版印刷。结果我们准时收到了胡绳写的题词。后来从胡绳秘书那里知道，他写这个题词时，正抱病出席江苏盐城举行的胡乔木铜像揭幕仪式，因化疗白血球降到很低，昏睡了一整天。稍好一点，勉力写出了这个题词。题词中，胡绳对《近代史研究》创刊100期表示祝贺，同时重提一个建议：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再说到1840—1949年的历史时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

这个题词发表后，对统一中国近代史学界的认识很有好处。我根据胡绳同志的意思，撰写了题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沉沦”、“上升”诸问题》的文章，1998年初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摘要，同年在《近代史研究》第2期发表全文，引起了学术界注意。

第二次是1997年9月11日，我给胡绳写信，信中说：“大著《从鸦